



一个大厨记忆中的名流吃客

张寅根 口述 周晓瑛 整理

60多年前,我只有13岁,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,成为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。因为是第一届,所以我和同学们毕业后还是比较受欢迎的,都被分配到了一些沪上知名饭店,有梅龙镇酒家、珠江酒家、新雅饭店等。作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,我毕业时还不满17岁,被分到了以苏锡帮为特色的鸿兴馆,之后几十年,又陆续在淮海路上的大新春、老人和、绿野饭店、大同酒家、远香居京菜馆等饭店担任厨师、总厨。

回过头来看我做大厨的这段经历,由于淮海路一带饭店云集,附近戏院、剧场众多,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局也在那里,不少海上闻人、文艺界演员都曾是我们店里的老吃客,其中就有盖叫天、赵丹等人。

鸿兴馆里“学生意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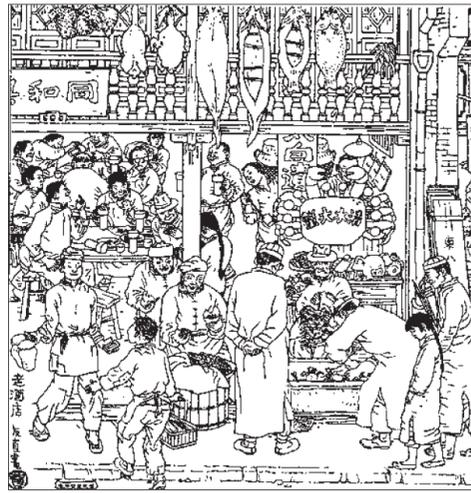
1959年,我被分配到鸿兴馆“学生意”,一年后满师。鸿兴馆位于淮海路普安路交界处,就是如今的中环广场那一带。当时鸿兴菜馆的菜价走的是平民路线,最贵的松鼠黄鱼才卖一元八角,便宜的像炒面、汤面、生煎馒头也不过一角二角。鸿兴馆是一家兼营炒菜和点心的“混搭”饭店,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开张,一直营业到第二天凌晨,既做早点心、下午点心、夜宵,也做正餐时间段的午市和晚市,总共要做五个档口。在那里,我做就是近10年。

每天天还没亮,鸿兴馆的排门板就打开了。不到7点,生煎馒头窗口总会排起长龙。有一次,我在店堂里做开市前的准备,只听到外面排队买生煎馒头的队伍里,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。凑热闹跑过去一看,原来是两个排队客正在互相“骂山门”,但也不是真吵架,骂的人和听的人,脸上都是笑嘻嘻的。再仔细看看,可把我和同事们给乐坏了,原来他们正是上海滑稽界的台柱演员文彬彬和范哈哈。

说起文和范,那时上海真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他们自编自演的《三毛学生意》在电影院公映时,几乎场场爆满。至今我还记得,文彬彬和范哈哈一个挤在队伍的前头,一个来晚了便挂在队伍末尾,两人叽里呱啦,你来我往,引得众人哈哈大笑,就连做生煎馒头的师傅也光顾着看滑稽,差点把生煎馒头给烧过头了。据老师傅讲,这两位滑稽界的泰斗,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常来这里排队买生煎馒头,都是好几十年的老吃客了。

除了生煎馒头,鸿兴馆的炒面也相当好吃,“闻上去喷喷香,咬起来有筋道”,尽管是起油锅炒出来的,但吞下肚不会觉得油腻。新中国成立初,大世界、大众剧场、共舞台生意都相当不错。每到晚上九点钟,附近剧院夜戏散场了,鸿兴馆也迎来了当天的又一个就餐高峰,而且大多是冲着炒面来的。就连北方籍的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也喜欢这里的炒面,可见炒面师傅沈朝丁的功力真的很不一般。盖叫天在离淮海路不远的东湖路有处住宅,只要他人在上海,便隔三岔五地差人专门来买几份炒面带回去,而且雷打不动一定是粗面加鸡丝浇头。有几次,老先生竟然亲自到鸿兴馆来了,当时那个阵势,可

张寅根毕业于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,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。他先后在淮海路上的大新春、老人和、绿野饭店、大同酒家、远香居京菜馆等饭店担任厨师、总厨。在淮海路掌勺几十年,他见证了沪上餐饮业的繁荣,记忆中也镶嵌了许多名流吃客的身影……



贺友直作品 均上海报业集团资料图片

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他和家里人乘坐轿车过来的,老先生身穿老式中装长袍,戴顶皮帽子,一个人大大走在前头,后面紧跟五六个家人。进入大堂,老先生坐到面向南的座位,一言不发,其他人围坐在边上,都不敢吭声。等到菜和炒面上齐了,只要老人家不动筷子,不发话,家里人便一动也不动……

客观地讲,当年逛饭店、下馆子其实并不是一件稀罕事,普通老百姓量入为出,还是消费得起的。不过路边小吃物美价廉,更受市民欢迎。记得当时,我离开了鸿兴馆,调到太平桥的“大新春”酒楼工作,店对面就是著名的太平桥小吃摊(这里如今已被改造为太平桥绿地中的太平湖景观区)。

那时候,光顾“路边摊”的小吃客中,也不乏名人面孔。有几次,我就撞见电影演员陈述骑着辆破旧的“老坦克”,跑到一家小吃摊位上,笃笃定定坐下来,优哉游哉地喝着花生米,惬意地咪起老酒。后来,我听摊位上一位师傅讲,陈述还做了一回伯乐,把一位胖胖的女服务员介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,参加体育题材电影《球迷》的拍摄。当时我还专门跑去看过这部电影,那位女服务员演得真不错,她在戏里和当时的名演员关宏达搭档,演一对“大块头”夫妻。

“老人和”与大同烤鸭

“文革”当中,我告别“大新春”,来到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——“老人和”菜馆。“老人和”是在1800年(清朝嘉庆年间)开办的。最早

的“老人和”开在老城隍庙一带,叫作“人和”。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,由于战乱,老板便将菜馆搬到了法租界的淮海路一带(位于今天的金陵中路龙路口),改名“老人和”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“老人和”基本维持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旧貌,一楼和二楼桌椅不同,楼下是长条凳,楼上是一人一座的太师椅。一楼走大众家常路线,类似于今天的快餐。楼上的菜式要精致许多,都是师傅一道道精心制作,慢火熬炖出来,味道自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当年,带我的老师傅们都有几道叫得响的看家绝活,譬如说炒鸡腰、红烧蹄膀、腌川、煎糟等等,但当年这些菜如今几乎绝迹了。就拿炒卷菜来讲吧,这里的卷菜可不是现在的卷心菜,而是野生青鱼的肠子,厨师起高火加热油,恰到好处地把鱼肠子炒成卷曲状,口感好,味道灵,让吃客真是回味无穷……

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又调到了大同酒家。讲到这里,读者可能会问,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,你这个厨师怎么动不动就“跳槽”呢?其实,当时淮海路上的绝大部分饭店都是国营性质,统一划归卢湾区饮食公司管理,不管你是“老人和”的厨师,还是大同酒家的厨师,说到底都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工,各饭店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很常见的。

大同酒家作为一家老店重开的粤菜馆,当时已经有了近50年的历史。店里最知名的一道菜,是港式的果汁烤鸭,这道菜后来还评上过全国大奖。要知道,当年淮海路上的众多饭店中,也就只有“老人和”的糟菜拿到过同等的荣誉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不少在“文革”动乱中

受到不公待遇的艺术家们陆陆续续得到平反,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。当时,经常来大同酒家买烤鸭的吃客里,有一位唱滑稽的名家杨华生。说起来,这位老先生还真真是蛮有意思的。烤鸭在出炉后,都是一只一只挂在熟菜间里,吃客们在购买时可以透过玻璃,根据鸭子的大小、卖相进行挑选。

可能是杨华生来的次数多了,熟菜间的切菜工都知道了他的喜好,总是很默契地为他精选一只卖相最好的鸭子,用刀切成小块,包装好后,笑眯眯地递给他。有好几次熟菜间换了人,杨老先生一见是陌生面孔,便把脸凑近小窗口,又生怕对方看不清,再补上一句:“依晓得我是啥人哇?”言下之意就是,我是杨华生,请帮我挑一只好一点的鸭子……

赵丹也曾多次光顾过大同酒家。他应该算是名气很响的大艺术家了,但真是很朴素,也很低调。那时候他大概60多岁,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的样子,但每次都是一个人过来,也不见有小辈陪着。我特意留心过,他从来都是乘26路公交车。在我们饭店,只要赵丹来,服务员都会主动安排一个小包间,让他静下心地坐进去吃菜。

说起来,当年赵丹点的菜其实也没啥特别,无非是一些口味清淡的冷热小炒,记得他还很喜欢大同的招牌汤——香菇凤爪汤,每次来都是必点的。赵丹最后一次来大同吃饭,是1980年夏天的事情,之后没多久,广播里就报道了赵丹去世的消息。直到现在,我还不时地想起当年那个穿马路走到26路车站的身影,想起大同酒家的小包间里那一碗香菇凤爪汤……

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)

浦东地名里的煮盐史

陈志强

浦东濒临东海,自五代至清中期,盐业生产是浦东地区的支柱产业。盐场范围内,逐渐出现了服务于盐业生产以盐民为主的一批早期聚落,有的还逐渐发展为市镇。

自南宋起至元代中期,下沙盐场的盐课司署先设在浦东鹤沙(今航头镇下沙地区),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下沙集镇。自元代中期至明朝中叶止,下沙盐业逐渐兴盛,盐场逐渐向东南延伸,此时此课司署迁至原下沙盐场南场址,新场集镇因此而繁盛。自明代中叶起至清朝中叶止,随着长江口逐渐向东南延伸,盐课司署又迁到了一团址,大团集镇得以形成。

时至今日,一些与盐业生产有关的机构早已消失,但还有部分盐业生产的机构及所属团、灶、路等名称转化为历史地名保存并延续下来,并成为浦东乡镇建制和行政村及自然村的名称,如新场镇、航头镇、大团镇、六灶镇、惠南镇等。

浦东煮盐制盐始于五代(907-960年)。在汉晋的古籍中,已有吴郡“沿海之滨,盐田相望”的记载。五代时期已有下沙盐场,泛指着航头、下沙、周浦、川沙等一带的沿海地区。当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,生产能力很低。

在宋代,盐利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,朝廷设置县盐监、支盐监、场盐监,以监督盐的生产。至北宋中期,改进盐的生产组织,实行集灶为甲的结甲法,在场下设灶,集中三灶至十灶为甲(后又改甲为分场);改进生产方法,推广煎盐“铁盘”。铁盘由数块铁片拼成圆盘状,直径可达数丈,重万余斤。各块中的间隙,用泥拌石灰填塞。铁盘搁在用泥块砌筑成的、与铁盘直径相同、高约二尺的矮堰上,即为灶。灶内砌若干砖柱,以承搁铁盘,留出烟口。盘上四周用泥、石灰、茅草混合而成的灰料筑成二尺高的围边,灌入浓卤,盘下灶内点火,以茅草、茅草等作为燃料,即可煎盐。

元初,盐场又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,立团定界,归并灶灶,建团立盘。或三灶合一团,或二灶合一团,并灶之后,打破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状况,以“团”为生产单位,连续使用大型煎盘生产,使下沙盐场的生产在元末明初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
明代,朝廷将下沙盐场所属的土地分为有司地和盐场地两部分,在盐民中划分出滨海灶户和水乡灶户。滨海灶户依旧靠煮盐课课,领取工本为生;水乡灶户虽仍属籍盐民,但不再从事盐业,改行种植、养殖业,将盐课折银缴官府。明代晚期,滨海灶户也可以折银代盐课,为灶户摆脱煎盐的劳役提供了条件。明代后期,“东南地涨”,河道淤塞无人疏浚,加上倭患的影响,额定盐产量仅为明初的三分之一。

清代,沙涨水淤,咸潮渐远,盐灶逐渐停煮。清道光十年(1830年),全部盐灶基本停煮。但与盐业生产相关的书画、诗歌、民谣、舞蹈、故事、地名等“盐文化”流传了下来,成为浦东文化的一部分。

上海云安建筑装潢设计有限公司

新春大拜年

咨询热线: 400-021-2956

集美学村的先生们

叶渊:集美学校的奠基者 (之三)

陈满意 著

1934年,叶渊离开集美学校,迫使叶渊离开集美学校的是许卓然案。关于许卓然案,陈嘉庚在《南侨回忆录》中有相关记载:“许卓然到同安见陈延香(同美董事)言拟代某军军饷三四万元,要向同美、同溪两车路公司息借,招陈君来集美与叶君商借款事。叶君答同溪车路公司重要董事住厦。三人约定越早八点在集美下船往厦。许陈两人复回同安。越早两人均未到,叶君乃先行留一名片托车站人交许陈二君云,伊在厦门太史巷街丰益钱庄等候。约近午间许陈始到,渡海至高崎村转坐汽车,来厦至美人宫换坐人力车,到太史巷街口下车步行,陈君在前已入丰益内,许君随后。再入内,枪声连响,许君倒于内,乃移往鼓浪屿医院,有顷而亡。陈叶二君均往探视,而凶手逃去无踪。”

许卓然是泉州晋江人,早年加入同盟会,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,在厦漳泉一带进行反清革命活动。1924年1月,许卓然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期间,孙中山委任他为福建党务特派员,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。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功臣,与孙中山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。1930年5月28日,许卓然到丰益钱庄与叶渊、陈延香见面时遭到暗杀身亡。

许卓然去世后,许家人怀疑叶渊、陈延香二人是主谋,将二人告上法庭,然而恰恰在此时出现一位陈德麟,陈德麟是集美人,在集美学校师范科没有毕业就到了新加坡谋生,在陈嘉庚公司的分店负责财务,侵吞七百多元之后,逃回国内。他多次向叶渊谋求职业,叶渊知道他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,予以拒绝。于是,陈德麟怀恨在心。在许卓然被刺,转移到医院救治时,陈德麟也在附近,听说后也赶到医院围观。在返回集美的船中,听到很多人讨论此事,陈德麟以知情者自居,说知道此事的实情。而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在医院看到的情形。然而陈德麟的一番话,传到了许家人的耳朵里,很快陈德麟被拘捕。陈嘉庚说:“其时许家主持人硬欲加罪叶君,然乏实证可据,不得不利用陈德麟为凶手,造作一篇供词,谓与叶渊同谋,伊任凶手等云云。严刑酷打极其惨苦,使不得不依词认罪。”陈德麟被捕后,被移往漳州军阀张贞处囚禁。张贞镇守漳州,在闽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,人称“闽南王”,与许卓然、秦望山友善,而“许卓然案”真正的主脑正是张贞、秦望山二人。

许卓然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,当时媒体纷纷报道。集美的广大师生和《集美周刊》也在积极呼吁,为叶渊鸣冤。当时的《公教周刊》载:“兹六月四日厦门思明地方法院,又票传嫌疑人集美中学校长叶渊(采真),到庭询问。观讯数百人。军警戒

备极严,结果叶应扣押。有集校教职学生代表愿以二千人担保,但法院不肯,终须入狱……”

叶渊、陈延香均被禁厦门监狱,当时厦门司法权属中央,张、秦二人鞭长莫及,于是谋划将叶渊移到漳州,并且屡次向厦门官方交涉引渡,实欲置叶渊、陈延香于死地。

陈嘉庚获悉后,急忙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胡汉民和古应芬,请二人急电厦门法官,阻止张、秦二人将叶渊、陈延香移到漳州。由于胡汉民等人的过问,张贞和秦望山的目的没能达到。

随后胡汉民又令将案移至杭州裁判,于是叶渊又到了杭州。陈嘉庚公司的杭州分店交了二万元作为担保,使叶渊免于狱禁。其间,曾回校处理校务。不久,国民政府于天津破获日本间谍案,谢龙阁承认刺杀了许卓然,案情始大白。案件纠缠两年多,国民党高级法院于1932年10月宣判“叶渊属被诬告,无罪释放”,陈延香、陈德麟二人也无罪释放。此案结束后,叶渊回集美学校继续主持工作。但国民党福建的军政势力仍旧继续纠缠,叶渊被迫于1934年离开集美,前往广西。

1934年11月11日,陈嘉庚在致集美各该校长的信中说:“本校公共之机关,代表鄙人者,必有坚强负责之人,对外对内,敢作敢为,任劳任怨,不屈不挠,庶可以有为,而图闽南教育之改革。叶校董先生虽可胜任,无如不幸为许案纠缠,回校无日,要再按延十年八年,亦意中事。”言下之意,对叶渊的离开倍觉惋惜。

不久,叶渊任广西省政府财政专员,旋往南洋各地,鼓励华侨回国投资,建设广西,后任省经济委员会监察处主管。抗日军兴,调任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多年,后转任省税务局长。黄炎培到广西后还曾受到叶渊的热情接待。

陈嘉庚为叶渊伸张正义,叶渊也对陈嘉庚知恩图报。后陈嘉庚到广西考察,离开桂林前往柳州时,叶渊陪着陈嘉庚坐火车到了柳州,到了第二天才返回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陈嘉庚暂回陈国庆冒险回国,主持创办了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友银行,每年将部分盈利补充集美学校经费。当时主要业务放在后方的广西,在柳州设立分公司,委托叶渊主持。叶渊随即辞去去广西省的优厚待遇,举家从桂林迁居柳州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西,叶渊一家随公司辗转于云贵川。

1940年10月27日,回国的陈嘉庚从永春到安溪,清晨到集美中学图书馆,校董会办公室视察,随后又出席了各界欢迎大会。当天下午,他专门赶到县内,“昂叶采真之母黄太夫人丧”。可见,虽然叶渊离开集美学校,但与陈嘉庚之间的那份情谊还在,而且陈嘉庚对于叶渊也是心怀感恩。

抗战胜利后,叶渊到了香港集友银行。1950年,又从香港到上海筹建并主持集友银行上海分行。1952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。